

人文对话

日前,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每一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结果都备受关注。而今年,第九届鲁奖的获奖结果实现了破圈传播,成为社会话题,引发广泛反响。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名单是如何产生的?从本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中,可以看到文学创作呈现出怎样的风貌和趋势?本期,我们邀请3位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委,请他们谈谈评奖感受,解答读者疑问,回应社会关切。

——编者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刘 阳

对话嘉宾: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范 稳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陈培浩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大连育明高级中学语文正高级教师 程玉玲

评奖机制革新,进一步确保公平公正

记者: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在评奖机制上有什么特点?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如何确保评奖的公平公正?

范稳:我认为,本届鲁奖评选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下,始终秉持大文学观立场,从评委会的构成到评选作品的范围,均体现出海纳百川、紧随时代、贴近生活、公平公正的原则。

评委会既有专家评委——作家、评论家、高校文学教授等,也有中学教师、文化传媒等方面的大众评委。我所在的中篇小说评委会里,就有一位来自安徽省淮北市一中的语文教师,他从中学语文教学、学生阅读等角度解析参评作品,为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评判视角。多元化的评委会组成也让评选视野更为广阔,评选标准更加严格。5轮评比筛选,每部作品都经过从通读到细读,从细读到精读,反复讨论比选,仔细斟酌剖析。无论是纯文学作品,还是类型文学、网络文学,评委们以文本为基础,对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研判,努力让评选出来的作品都能体现出新时代文学开拓创新、繁荣发展的新面貌。

陈培浩:评奖是否公平公正是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程序设计和评奖机制对此影响最大。事实上,在集中评审之前,评委们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了阅读。集中评奖期间,大家更是心无旁骛,按照工作进度阅读、讨论。

就我的感受和观察,本届鲁奖在评奖机制上有这样一些新特点:一是评委根据相关条件从评委库随机抽取,所以这次有很多新面孔,打破了以往社会上关于评奖“圈子化”的质疑。二是大众评委的加入,也是本次评奖机制上的亮点。以往评委会全是文学创作及评论界专家,这次语文教育一线的教师及媒体界人士也参与进来。他们的加入优化了评委结构,打破了审美局限,还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客观上促进了大文学观在评审中的落实。三是评奖关键阶段手机集中保管制度,让评委们屏蔽了外界干扰,更专心、安静、从容,更有利于公平公正评奖。四是主动借助科技手段对参评作品进行原创性鉴定与把关,遵照评奖条例,郑重、认真、公正对待每一部作品,取得了很好效果。五是增加推荐作品数量、拓展申报渠道,网络首发优秀作品可直接参评等新举措,让更多好作品有机会进入评奖视野,保障推荐环节的公平公正。

程玉玲:作为一名高中一线教师,我和其他5位大众评委都是本届评奖机制革新产生的幸运儿。和以往相比,本届鲁奖第一次吸纳了中学一线语文教师。中国作协相关负责同志在电话中对我说:“我们今年的变革就是邀请在语言文字一线深耕,有成绩、有影响的中学老师加入到评审专家队伍。相信你们的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评审需要你们的读者视角,这对于获奖作品的传播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要我总结今年评奖机制的特点,我觉得是既站在高处也落到实处:评审专家有资深作家、出版专家、大学学者,也有立足教学一线的中学教师。

至于如何保证评奖公平公正,我了解到本届鲁奖评奖办公室遴选评委严格落实“无关联”,要求评委与参评作者无关联,与推送单位无关联。评奖工作中严格要求民主开放。评委对作品要认真阅读,形成自己的意见,研讨时大家充分交换意见。评审工作中,我们经常在预定的研讨时间之外临时加早会或晚会,有的

文学创作不再是专业作家独有的领域

从鲁迅文学奖看创作新趋势



作品会经过多轮研讨、多个维度研判,直到达成共识。

一场大众均可参与的文学巡礼

记者:从本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来看,近年来文学创作和文学队伍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范稳:总体来看,本届鲁奖获



奖作品时代特色鲜明,历史书写视角独特,文化底蕴丰厚,艺术探索新颖,风格形式多样。在反映现实、贴近生活、传承文明、钩沉历史诸方面,既有文学高度,也有人间温度,是对近4年来文学队伍的一次集中检阅。老、中、青作家,不同文学类型的作家同台竞技,集中亮相,让我们感受到文学殿堂不再是象牙之塔,而是一场大众均可参与的文学巡礼。每部获奖作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了大文学观视域下的时代特点和蓬勃发展趋势。

陈培浩:这些新特点和趋势体现为:一是新大众文艺崛起,既有流量,又有精品,不少作品完成了从新质突围到优质创造的转变,令人期待,予人启发。二是现实主义写作持续走向深化,现实主义观念变得更加辽阔丰富,既有大国重器、乡村振兴、人与自然,也有凡人日常、养老看护、青少年心理危机等。三是资深作家老当益壮,精彩不断,中生代作家中流砥柱、承上启下,青年作家敢为人先、异彩纷呈。

程玉玲:百花齐放是我直观的感受。从作品角度,阅读参赛的报告文学作品让我特别长见识。我最早接触的报告文学作品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近些年常教学的《夏衍的《包身工》,所以我心目中的报告文学还是比较“传统”的。阅读参赛的370多部作品,我发现除了传统写法,一些作品有新的写作思路,比如跨文体和非虚构,梁鸿的获奖作品《要有光》就是一部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从作家角度,深耕文坛的老将老当益壮,新兵头角峥嵘。而有很多非职业作家甚至非中文专业出身的人为文著书,成了一种让人惊喜的趋势。

文学与影视合力共生,各有精彩

记者:本届鲁迅文学奖的一些提名和获奖作家,也长期深耕影视创作领域,他们的部分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获得观众喜爱。近年来,文学与影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作品转化越来越多。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范稳:文学是一切艺术形式之母体。无论是重述历史还是反映现实,文本质量高、基础好的文学作品,都具备影视转换的可能性。

优秀的文学作品借助影视,可以扩大知名度,增强社会效应,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的文学作品,影视转换率一般都比较。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梁晓声的《人世间》、金宇澄的《繁花》等。前不久,陈彦的《主角》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后,吸引更多阅读原著。现在中短剧盛行,如果说长篇小说是长篇电视连续剧的母本的话,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则为中短剧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题材资源。文学为影视奠定厚实的基础,影视则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装上了一对有声有色的翅膀,让它飞入千家万户。

陈培浩:本届获奖作品不少被影视界关注和改编,客观上印证了其艺术魅力和走向更广大读者的潜力。

事实上,文学一直为影视源源不断地提供优秀的原创故事、创意和思想。20世纪80年代,张艺谋改编莫言的《红高粱》就风靡一时。后来像苏童、刘震云、刘恒、

麦家、梁晓声、陈彦等作家作品的影视改编都很成功。文学和影视是共生体,文学为影视提供创作之源,影视则对文学进行二创,并将其推向更广大的人群。不过,文学和影视有各自的艺术特点,文学也有影视所不具备的艺术优势,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要以影视化为目标。合力共生,又各有精彩,是最佳选择。

程玉玲:这个问题恰巧是我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常常设置给学生的问题,比如教鲁迅先生的《祝福》,我会给学生看相关的影片,让他们比较影视和文学的不同,以此培养他们的学科素养和审美鉴赏力。我觉得“本立而道生”,文学作品是“本”,没有好的文学作品很难成就出色的影视作品,作品转化是好事儿,能让经典文学作品雅俗共赏、口碑载道。

传播破圈引发大众共情共鸣

记者:“外卖诗人”王计兵获奖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事实上,本届鲁迅文学奖在传播上实现了破圈,不仅获得了文学界的关注,也赢得了媒体和更广大群众的关注。在您看来,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范稳:“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获奖是本届鲁奖评选彰显大文学观的生动注脚。鲁奖获奖作品在注重专业水准基础上,显得更具亲和力,更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王计兵那些质朴、有温度、有感染力和穿透力的诗行,感动了无数读者。本届鲁奖评委会及时发现这位来自



生活一线的“外卖诗人”,用鲁奖奖掖其文学追求和文学成就,是对新大众文艺群体的致敬。王计兵获得鲁奖诗歌奖成为现象级的话题,正说明广大人民群众需要能为他们代言的诗人,时代需要更接地气、更温暖人心的诗歌。

陈培浩:本届鲁奖传播破圈,应该说是评奖机制获得了各界认可,获奖作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内心关切,审美趣味与更广大群众产生了密切互动和内在共鸣。内在看,跟本届鲁奖评奖以大文学观为统领有关,大文学观回应的正是新时代不断涌现的文学新现象、新类型、新质素。本届鲁奖把它们纳入视野,作出公正肯定和专业加冕,嘉行自有回响。

程玉玲:正是因为大批非科班、非专业的普通人走上写作之路,文学创作不再是专业作家独有的领域,这种创作主体层面的圈层突破,自然而然带动了传播层面的破圈。因为当大量普通人的故事与情感被文学化呈现,自然会引发大众的共情与共鸣,本届鲁奖获得各界关注,也是我们生逢盛世的最好注脚。

人文茶座

大地的恩赐

艾 平

我在呼伦贝尔大地上行走,像阅读一本书那样去观察植物、动物,去亲近那些身上带着文化“包浆”的牧人和猎人,也结识了一些有文化的新牧人和草原森林的守护者。我的散文集《天生草原》能够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源于大地母亲的恩赐。

我见过老阿爸用冰水埋葬马群时的凝重;我和一位额吉在寒冷的蒙古包里待了一夜,接生下一对双胞胎羊羔;我知道,哈吉鄂温克牧民胸前那三道不同颜色的绸缎,蓝色代表水,黑色代表土地,红色代表火,他们带着对大自然的感恩走过了沧桑岁月;我抚摸驯鹿油润的鹿茸,听一位鄂温克好友讲述驯鹿和人类共生的故事;我了解额尔古纳撒欢儿牧场主人赵红松的故事,他大学毕业返乡,搞旅游生态研学,救治过很多野生小动物,为了保护3000亩野生赤芍不被盗挖,几次被恐吓毒打……我用在地者的眼光看草原、看森林,看时代与这块隐秘之地的互动,常常惊喜交加,深深感动。“变”是最有魅力的,所以我不满足于将文字停留在自然之谜、生态故事的层面上,而是把人的成长、文化间的比照、生态的复苏作为一个有机体来书写。

阅读我的新散文集《天生草原》,你会看到——阿爸宁肯冻僵了胳膊,在暴风雪中高举手电筒,也要给知青引路;在《阿哈的金牌》一文中,阿哈(哥哥)和天津知青蔡乐铭在游牧中成为生死之交,分别前,他把自己最宝贵的全国摔跤冠军金牌送给了蔡乐铭,精心保存多年以后,蔡乐铭又将这块金牌送回到草原博物馆;在《阿敦乌拉的天上》,牧民孟和沙舍开放牧必需的羊羔皮马蹄袖,把死去的羊羔留给养育雏鹰的母鹰;《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中,老祖母用学狼叫的方法唤来狼群,保护了刚刚分娩的母狼和狼崽……这些人物“古老”而“年轻”,闪烁着地域文化之光。

我知道,散文要引人入胜,需要生动又有诗意的细节来支撑,我正是在生活中发现了这样的细节,才开始动笔的。写《哈拉海进城》,动笔的缘由是自己当年作为工作队员,曾在扎赉特旗四平山二队,和农民一起靠野菜哈拉海充饥度日,到了旅游时代,发现哈拉海竟然成了当地招牌菜。在《阿哈的金牌》一文中,有了生存经验的知青,用腰带把新来的年轻干部吴宝贵与一只牧羊犬系在一起,跌跌撞撞逃出了几十里的暴风雪,当吴宝贵终于进了温暖的蒙古包,接过主人递来的手把肉,饥寒交迫的他没有吃,而是先端给了那只忠诚的牧羊犬……正是这个细节让我追寻到了当年牧民和青水乳交融的故事。文学的真谛在生活的深处珍藏着,多年以来,我就像一匹老马,在故乡的大地上徐徐而行,每一阵风吹过,我都想知道,风的“缝隙”里有哪些微妙“异动”。父母一般的呼伦贝尔大地,让我知道生态怎样塑造人类,知道生态对文化和历史不可忽视的影响。

文学创作者,应该是文化的建设者,我们需要不断探索万物共生的哲学,需要用新观念和老经验来理解生活,需要用引人深思的文学形象、优美而有锐度的语言来厮守、捍卫我们的大地。因此,深入生活、忠于生活,永远是我写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我期望用自己的文字告诉世界,人类曾经如此这般地在草原上走过。

(作者为作家、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图①: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季栋梁。
图②: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艾平。
图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金勇先。
图④: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遵义三日》。
图⑤: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低处飞行》。

以上图片均为中国作协提供

常中正摄

本版责编:郑海鸥
版式设计:沈亦伶

